

# 中国社会与经济不平衡发展测度 与治理方略研究<sup>①</sup>

周靖祥

(济南大学商学院)

**研究目标：**解构中国式发展不平衡发生发展机理和运行机制。**研究方法：**借助宏观统计时序数据，将提取的党中央全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作为权重（针对某一具体发展问题进行的轻重缓急区分），继而展开不平衡发展与治理的风险评估、诊断，运用阈值法进行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具有明显的跨时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和动态复杂性，1982年以来呈现明显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演变趋向；2012年后，党和国家治理方略重选使得发展向着动态平衡目标逼近的可能性在增大。**研究创新：**引入党和国家治理主体，建构“体制的特殊品性”二重性理论框架。**研究价值：**构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论，提供不平衡发展治理方略选择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 不平衡发展 失衡治理 开放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 引言

无论于使用平衡（均衡），还是失衡（非均衡或不平衡）等词汇来描述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或是经济发展演进方向，所使用的概念本身并不重要，且各向度的描述都有相近的内容表达；理论界关注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宏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运行状态所进行的动态性刻画。极有必要重申，对封闭、开放经济所开展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既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已经成型理论和经济科学发展都在逐步地向前演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德鲁克在1986年的预言，他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一文中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一旦货币供求关系偏离实体经济，金融与经济“两张皮”的发展时代一经出现，两者的数量关系即发生异变。一国或地区管理当局，若采用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不适当的刺激手段，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和稳定的发展。<sup>②</sup> 中国经济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内外经济联动与平衡的变幻轨迹更趋于模糊。纵观60余年的增长和发展实践，并不存在标准的、唯一的道路选择模式；能够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路线图即为：封闭型经济转开放型经济，背离平衡转向失衡，由不平衡到再平衡。

受制于新时期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内外经济的平衡关系由单向度向着不确定、不平

<sup>①</sup>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预警系统设计及平衡增长路径选择”（批准号10CJL036）的资助。

<sup>②</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衡的多维度方向演化。就内部经济运行状态而言,1949年以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给经济降温,国家及经济管理部门往往会采取“紧缩到底”的组合型政策手段,时常出现一下过热一下又过冷,短期的剧烈波动成为一种常态。虽然短期的增长目标一般都能够得以顺利实现,不平衡发展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剧,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伴随宏观经济运行调整的全过程。进入21世纪,中央在不断地创新宏观调控思路,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或是货币政策,但宏观经济管理遵守着“一切从简”、“审慎”和“稳定化”原则。判断的依据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表述多少有些相同之处,顺应着经济发展形势、新出现的矛盾,通过各项经济工作实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目标。不同时期,无论何种思想和战略、发展策略的形成,都高度地切合于某一时期持续存在的棘手难题,各项社会与经济政策要达到的目标也总是为克服系统内外的主要约束条件而制定。

财政与货币平衡一直都是总量供求平衡的核心内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则是创新宏观调控、实现平衡发展的关键领域,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更像是将经典经济学理论理想本土化。结合2016年和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不难发现,中国式平衡发展实践正在创新“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其主要目标实为构建货币政策传导新渠道和新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以更贴近中国实情的手段来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配合选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化解债务风险。将货币存量作为唯一且有效的政策工具,由政府相机选择一个时点公开宣布一个数值“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此目标值是为了能够保证物价稳定水平与预计可能实现的一段时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相一致。中国经济发展,融合了政府干预和理性预期的思想主张,并非单一的经济思想。为此,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不足为过。失衡,也将会以一种货币形态表现出来(货币化的经济指标)。经典的货币需求方程又是这样来描写的:

$$\frac{M}{P} = f(y, w; r_m, r_b, r_e, \frac{1}{P}, \frac{dP}{dt}; u) \quad (1)$$

上式中, $M$ 表示微观经济主体持有的货币量; $P$ 表示平均物价水平,即一揽子价格指数, $M/P$ 表示真实的货币需求, $u$ 则表示诸如个人偏好等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 $y$ 为国民收入水平, $w$ 是实际工资水平, $r$ 用以刻画各种利率。展开此处论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即为剑桥方程式: $M=kPy$ , $k$ 为货币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综而观之,中国实践潜藏着重大理论建构的丰富素材。并不缺少构建本土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理论大好时机,诸如发展战略选择理论,机制设计理论都有着巨大的创新机会。若是要将经济由失衡向平衡转轨发展的道理阐释清楚,则需要明晰失衡内生于经济系统。遵循政治与经济联动的中国式开放型经济发展,是否也会嵌入一种特殊的内在的自我调适和平衡机制。

纵观已有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尚未存有一整套的、完善的理论体系能够对中国式失衡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列举一些经常被理论工作者惯常使用刻画经济运行状态的频次较高的词汇,诸如危机、周期、波动、发展与增长等。用以刻画一种运行状态,不平衡或称其为失衡是长期性概念,平衡是短期性概念。内部是针对封闭经济体的描摹,外部则对应于开放型经济特征事实。为深入开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本研究力图依据相关理论构建起能够区分全局的和局部的、长期的和短期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开放条件和封闭场景、实体的和虚拟的、长远的和暂时的、动态的和静态的不平衡理论框架,并提供实证证据,借此才能讲得清楚、说理明白。在开放经济体系构建时序上,中国政府先行开放经常项目;资本金融项

目开放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在构建起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体系格局。

本研究关注不平衡发展的测度与分解,重视失衡预警和跟踪监测的方法设计及应用,将有助于不平衡治理理论和手段创新。边际贡献:第一,构建起契合于中国国情和发展走向的内外经济失衡分析框架,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经典理论,通过数值测算深入解析不平衡发展学理命题,做到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的统一。第二,构筑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总指数和内、外失衡分指数,建立经济失衡预警系统评价模型,指标权重赋予主要借助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词频呈现,较为完整的内外经济不平衡量化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第三,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进行微观解释,认为宏观经济失衡及其后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所致,寻求解释宏观经济失衡的微观证据。通过提取不平衡发展事实,构建理论以解释发生机理,创新失衡治理新机制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从而能够更好地丰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涵。

### 一、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不平衡发展实践及治理

#### 1. 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对外经济战略:向着更高级形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目标迈进

论及不平衡,不可避免地讨论经济学理论表述中的总量供给与需求的失衡<sup>①</sup>。深层次的矛盾则是部门不平衡发展促成的结构失衡,只要城乡和区域、货币、劳动力、产品、金融和外汇、内外进出口贸易中的任何一个市场失衡,都可能加剧总量失衡。审读文件发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表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和调整<sup>②</sup>,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及,“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供、产、销售之间也不平衡。当年的报告还重点着墨,“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之间的平衡”,“财政的收支平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新的平衡,如此螺旋式地反复,不断前进,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运行态势反映。1982年以后,历次党的报告中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表述做过两次调整。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动态的,平衡是暂时的,并非一成不变。在党的报告中,党中央高度重视与经济发展状态变幻,透过“发展”“人民”“强国”“协调”“平衡”“风险”等词出现的频次,能够勾勒出一幅通过化解和风险,中国正在努力建成平衡的、更加开放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强国。

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内外部政治和经济问题放置在一起进行深度阐述。原话表述即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论及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业已对外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透析未来发展策略选择,将始终会嵌入区域联动和协调新战略,也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sup>①</sup> 在各种官方文件中,或更早期的官方话语表述也会使用“失衡”与“平衡”之类的词汇,实用英文的表述则被统一为“Balance”和“Imbalance”,若是将“不平衡”作为形容词的所对应的英文则是“Unbalanced”,动词“再平衡”的表达即为“Rebalance”。在本文中,更多地使用“失衡”表述,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则取用中国语境下的“不平衡”的表述,两个词语在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多半是相通的。

<sup>②</sup> 历届全会报告电子版原文参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历届政府工作报告电子版参见 [http://www.gov.cn/guoqing/2006-02/16/content\\_2616810.htm](http://www.gov.cn/guoqing/2006-02/16/content_2616810.htm)。

的开放格局”。重要举措有,“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回看历届党的报告中关于不平衡发展事实阐述及与时俱进地谋划应对措施的文本表述,不难看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策略选择都带有战略性、长期性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中共已将未来应对不平衡发展的策略导向、中心工作升格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早前,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四大报告对不平衡及治理都有关深刻阐述,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论及失调时,原始文字表述为“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审时度势,自觉地及时地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衡,以经常性的小调整来避免比例严重失调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大调整”,“经济总量平衡同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论述则是“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才能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透过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战略定夺的总论调,不难发现,党和国家总在坚贞不渝地追求更高层级的内外平衡发展目标,更加注重供求平衡,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平衡目标也更为艰难。

2. 统一于政治与经济联动分析框架下的内外不平衡发展及治理:总体要求是“稳中有进”

有趣的是,借助政府工作报告(年度的后向的与时俱进地)关键词测度内外经济不平衡发展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党的报告(长期的前向的带有战略性地)对“平衡”的强调频次较多,随着发展向着平衡的方向调整,报告中不再过多阐述时,不平衡发展的程度又会不断地恶化,然后又强调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严重性(频次增多)。就此问题而言,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党的报告具有前向的战略导向功能。平衡的发展是一种非常态,不平衡是常态,动态演化方向带有不确定性,拿不准未来会向着何种方向变化。借助笔者的测算结果进行统计发现,不平衡发展指数高于全部年份平均值水平 3.95 的年份有 37 个(占 60%),其中 25 年低于 3.95(占 40%);因时而变的动态平衡水平值高于 3.95 的年份有 46 个(占 74%),低于平均水平值的年份仅有 16 个(占 26%)。总体来看,动态平衡水平值分布更趋近于吻合于统计学意义上的“二八定律”;关注不平衡发展的治理,实质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总治理内容的高度抽象。

不平衡治理与不平衡发展相随相伴,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治理水平顺势提高,在应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相机处理过程中,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不平衡问题在不断地恶化,迫于形势必须直面失衡问题,并积极主动地进行应对和调整。将不平衡发展和失衡治理两个变量进行线性拟合结果表明,拟合度达到 0.8。<sup>①</sup> 综合来看,2012 年以来,不平衡发展问题已经不断得以调整,治理水平已在不断地提高,1953 年以来不平衡的稳定的递减变化态势自从未出现过;未来,经济发展将会更加平衡;2017 年,十九大对此问题更加重视,是否按着理想的目标迈进,将可以借助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实践来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平衡发展程度一旦恶化 1 个水平值,党和国家的失衡治理能力就会提

<sup>①</sup> 不平衡发展指数是作者测算的结果,标准化处理之后取值介于 0~5 之间,测算方法在后面内容中会做详细阐述;测度发现 1953~2014 年平均值是 3.95,作为判断平衡的判断基准之一,标准之二,则是“0”值为基准,如果该数值向着零值逼近,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平衡”。“平衡”表征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全会(1982 年以来每 5 年一届)报告中该词出现的频次数。由于完稿时 2015 年的大部分宏观统计数据还不可得,测算结果仅到 2014 年。十九大报告公布之后,报告中“平衡”的频次已知,此指标已经可以顺延到 2022 年(5 年才会发生一次变化)

升9个水平值。当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GDP增速、宏观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来刻画不平衡发展时,结果与本研究的不平衡发展测度极为一致,当然也可以将此表述为“中国式平衡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和快速工业化进程中,越追求“平衡”的增长实践,结果反倒是越发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国不平衡、非均衡的增长实践,结果反倒使得发展运行的结果更趋于“平衡”。通过审读非均衡增长论者构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能够从中找到不平衡发生机理解释的关键文字和核心思想。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比如“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基本原则;当然,也得承认,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性缘起于发展过程带有诸多不确定性,虽然实施平衡增长战略,但也极有可能会引发诸多经济不协调或失衡棘手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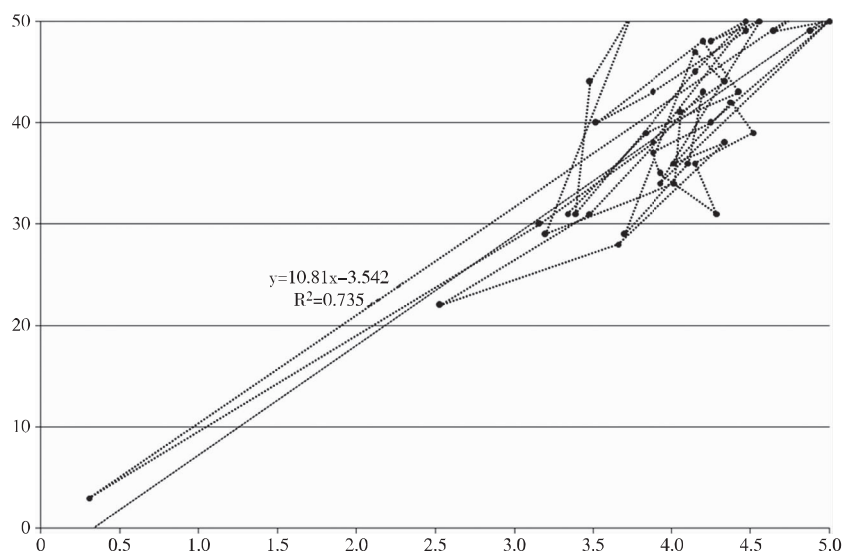


图1 不平衡的发展和治理的关系

注:纵坐标对应的是不平衡治理水平指数,横坐标对应的是不平衡发展指数。不平衡治理是作者借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测算的结果,取值标准化处理之后,分布于0~50之间。矛盾一词概括了经济与社会、内部与外部,其中“不平衡”和“矛盾”表征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1982年以来每5年一届)报告中该词出现的频次。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对“矛盾”问题的强调次数为16次,能够与1987年(21次)、1997年(18次)相比。

### 3. 亟待将新时代中国实践上升为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透过分析发现,毛泽东的不平衡和平衡发展思想主张源泉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转换是基本形态,体现为一种波浪式的循环往复运动。马克思也将其描述为,“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意味着,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常态的,平衡则是消除不平衡的一种必然结果<sup>①</sup>。现代的平衡发展理论,理论基础主要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代表性理论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

<sup>①</sup> 在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中,他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视角切入对诸多经济现象加以分析,比如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斯的平衡增长理论。前者强调平衡只是一种基于供求关系调整而进行的外部经济治理效果的反映。平衡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两种恶性循环,势必需要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实为必要。21世纪伊始,中国的各项战略和具体政策安排皆为实现“协调”和“联动”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都高度重视发展的平衡。

关于不平衡、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早有研究论及,一句话概括为“把市场调节能够起作用的部分用CGE模型来表达,将是有益的”。在1985年,周小川等人就用RP方法(递推规划)给出宏观经济平衡增长模型框架,以课题《2000年的中国》展示相关定量分析结果。该研究认为:其一,经济系统往往是大规模复杂系统,应该注重各种分解技术的利用;其二,应该充分重视经济模型的各种前提,及各种假设的逻辑隐含;其三,单一的优化方法往往由于数学形式上的种种限制,最终使模型偏离实际。其四,RP框架便于表达各种不同的理论,政策行为,便于进行多方案试验,也便于与实际工作者对话。就中国不平衡发展问题的解释而论,并没有一整套娴熟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运用;方法论原理虽是相通的,然而中国实践却较为特殊,中央和国务院共同指引经济建设尚属全球唯一,中国有过平衡(综合平衡,也即全局平衡)的丰富实践,也有过非均衡增长实践,又开启了“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实践行动。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创新,并非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总能够找到制衡方略。

## 二、从封闭走向开放型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形成之理论基石

通过梳理历年中央的政策和文件,能够透视中共主导的社会经济战略思想大转变。1978年以前,各项战略都过度地集中强调经济增长;1979~1994年,转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谋求可持续的思想引领倾向;1995年后,中共逐步深化了经济与社会平衡、同步发展的思想观念。2012年至今,党和国家积极主张和落实更加全面的平衡和联动发展观。国家(中央)主导经济发展方向,实践政策也随着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思想引入而进行变化。

### 1. 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和内外均衡发展的理论思想:丰富动态总体平衡思想的内涵

回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型跨越和战略转变历程,借助三个“从”句(逻辑起点)可以概述其总体特征:①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从更加关注发展目标实现的时间面,转向关注空间协同性,再转而重视时空一致性(平衡性);②发展方式上,从过去过度地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转向开放(再次打开国门)发展,更加注重“为我所用”;③谁主导发展,从强调党委、政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体唯一性,到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共中央主导思想转变的根本要求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谋求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应对三大转变的大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运行治理逻辑。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内生性色彩更加浓烈,战略调整时都相机利用好“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性。

顺藤摸瓜,追本溯源,找到国家发展战略思想转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即使是在中共执政党内部,由于各项政策目标偏好的不一致性,必然会导致发展战略选择的异质性;不同发展阶段,中共最高决策层具有不同的决策偏好和价值观导向(李达,2005)。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很长一段时期实施的是有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1978~2001年),发展中与时俱进地制定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为敦促地方积极推进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所实施的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主要采纳了比较优势经济思想,中央和地方政府举全力推进和落实“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与出口导向(Export-lead)”相结合的战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正在深度推进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2002~2014年)。当中国成长为“制造和经济总量大国”之后,乘势追击随即开始谋划和实施更深层次、更广阔区域的对外开放战略,诸如“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早前,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都专门论及“两个大局”发展战略,邓小平的表述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sup>①</sup>。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指出,“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sup>②</sup>事实上,综合平衡发展理论思想,不仅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还触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外部经济),财政、信贷的资金平衡以及主要物资平衡等内容。该理论运用的适宜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注重于研究国民经济的总量(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变化,可以进一步再分解为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和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有着一套娴熟的逻辑体系,有章可循,又遵循着围绕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中心”法则。

## 2. 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对外经济战略:中国式内外平衡发展理论创新重大契机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其实都是对西方理论和学说而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中国经济经济学发展亟待摆脱西方经济思想的羁绊。无论是全球性问题、时代性问题,还是中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现实发展难题,共性就是具有高度的交融性、综合性、整体性和有机性。能够用以解释中国发展事实的成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较为欠缺,即便如此,理论工作者依然能够从不断向前演进的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升级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找到解释中国实践的“思想源泉”,有太多的经济事实支持“理论指导实践”的精辟论断;反过来,总结中国发展试验并上升为理论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十余年前,有学者就曾主张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需要把握“问题本土化”“研究方法适用化”“思想和理论适度化”。正当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发展宏观研究陷入“停滞”状态之时,立足中国背景的内外发展失衡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sup>③</sup>失衡或平衡发展学理研究之基本原则:动态性,战略性,系统性和平衡性;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问题,随时间而变的动态分析视角,平衡发展道路选择的战略选择(路径安排),全面审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难题,则须将“平衡”二字嵌入到实证研究内容当中。

学界出现对中国失衡增长的忧虑及未来发展迷局破除困境实属必然,其根源在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中“失衡”与“增长”长期共存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实践的不一致,将经典经济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失衡发展”和“超常规增长”解释力不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发展瓶颈,即失衡发展如何向平衡靠近?针对于此有必要将“有利的”和“不利的”失衡加以区别和对待,研究失衡对公平及长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相机解决内部和外部

① 具体内容参见《中央要有权威》,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② 该文于1956年4月25日发表,刊登于《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第1版。

③ 相关成果发表参见周靖祥(2012)。

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恶化的棘手难题。经济学研究问题必需考虑的两大范畴：效率与公平，所建构的理论要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来检验。理论与实践总会在发展中实现互动，任何国家都会将增长与发展视为永恒的主题，中国并不特殊。①中国经济不平衡向平衡转变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必然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当前恰好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至今需要实现自我转型的大好良机，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研究需要借助历史与逻辑统一规范研究方法。②中国发展失衡也只能是在常态中进行调整，由于各省市自成“小型开放经济体”，解决内外部失衡必须兼顾区域和城乡融合以实现平衡发展。一旦放弃谋求城乡公平、区域公平和国际社会公平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有可能存在适度的失衡与平衡相对应。③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同步势必需要同步调整，相机选择实现“共同富裕”的平衡增长道路；改革与增长相得益彰的成功绝不是巧合，未来中国经济“内外”同步改革才能获得更平稳的增长和更公平的发展。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发生更具不确定性。一国经济的失衡，只是封闭的全球经济失衡的“一角”。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则要求将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研究放置于全球经济失衡大场景中，后者终归集中反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外部贸易经济的长期摩擦过程。发达国家经济失衡普遍受青睐，发展中国家的内外经济失衡多是经验性的事实描述，或是给出规范性的直觉判断，尚存在理论空缺。综观而论，大量研究侧重从汇率和贸易以及分工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失衡，实证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大量丰硕成果，却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理论支持。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理论：将内外均衡和供求平衡理论中国化

经济增长或发展，是一种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了。新中国经济实践，更加注重强调国内经济平衡的重要思想。在1956年就已经定调了内部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①应该根据形势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②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战略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分析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之后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sup>①</sup> 内外经济发展并重，其中还有一段话语值得一提，表述为：“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

从党的文件中去寻找开放型经济的文字表述内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存有这样的文字表述：“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十八大报告则使用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样的文字来加以论述的。需要注意，把继续完善的“开放经济体系”内容主要关键词的位序做了微调，其中“互利共赢”的位序由2007年的第二提到第一，而之前位列第一的“内外联动”被新的表述替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平衡”。本研究与一般的开放型经济的报告表述不同，而内外平衡只是一种更为折中的表达。纵观60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历程，并不存在标准的、唯一的道路选择模式，一张较为清晰的路线图即：计划—计划加市场，外生要素主导型增长—内生制度驱动型增长，封闭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均衡发展

① 参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486/70506/4812023.html>。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展—非均衡增长—协调和联动发展。既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尚未存在一整套的、完善的理论体系能够对中国式失衡发展进行解释。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经济体（国家），平衡终归是一种共通的目标，平衡与失衡也绝非千沟万壑不容越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切倡导和主张很可能与使用内生功利主义倾向的边际分析方法所求解的最大化资本回报不相为谋，在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方面各方研究却是殊途同归，皆为探寻一种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建构。既然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实践的谜题众多（经济建设中总是非常规出牌）；因经济建设实践中融入了马克思、列宁、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要想探出不平衡发展之究竟，也就无法简单地借助于某一成型的理论、使用于一般的方法得以实现。变化着的实践需要变化着的理论来解释，变化了的理论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实践，实践为新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三、平衡发展理论基础与测算方法

#### 1. 植入计划和综合平衡思想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平衡论

借助于物理学的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平衡。当系统各处可测的宏观物理性质均匀（系统内部尚不存在宏观不可逆过程）的状态，即为平衡。通常而言，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性系统（不管它是物理的、化学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一旦能够通过变化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从而由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是功能上的有序状态。然而，从无序状态过渡到耗散结构稳定状态的必要条件是：①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即系统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②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中物质、能量流和热力学力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常态是失衡；③系统内部不同元素之间也会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并且需要不断输入能量来维持。精读这些文字，不难发现可以将其植入宏观经济内外部运行状态研究中去，更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某种意义上讲，综合平衡理论专门针对于计划经济理论。然而，计划经济发展理论中虽然提出综合平衡的思想倡导，但拒不排除局部平衡和单项平衡，也即宏观经济系统中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项经济活动的平衡。同时潜藏着微观构成的分析，原因是微观的单一平衡是以宏观的综合平衡为前提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CGE），并非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制度属性的经济增长运行类别。20世纪8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实施的高度计划的经济建设行动，其运行机制恰恰是满足了“可计算”基本要件。综合平衡理论与分析方法，也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运用。经济系统本身就具有自调整随机动态变化的内在特质，其稳定性会受到决策机制影响，经济系统在任意时刻的运行状态都依赖于以往的演变动量和决策机制，市场调节的部门经济可以用CGE模型来表述（周小川等，1985）。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文献中，以研究经济中的总量平衡为主，兼顾结构平衡，重点关注资金与实物运动的内在联系，注重静态平衡与动态平衡的统一结合。在动态平衡研究方面，既揭示总量平衡对当期经济稳定的影响，也会分析其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既考虑一个计划年度之内的平衡，也考虑一定时期（多半会是5年）内的平衡。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既分析总量失衡对物价波动的影响，也测度物价波动对总量平衡的冲击。

长期来看，经济总是会不断的增长，发展也会不断地向前演进，结果是供给和需求总量曲线发生位移，两者之间的平衡（或称其为均衡）关系也处于连续变化过程之中；一般情况下，每一个时期平衡点的位置都不会重叠。由此看来，时间会改变失衡或平衡运动轨迹和变

化幅度,长期动态平衡研究的内容也恰恰是随时间推移而从一种平衡向着另外一种平衡变化的过程。测度失衡,分析不平衡,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其理论基点则是平衡、协调(左然,1988)。在其思想体系中,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是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规律的所进行的深入探讨。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抑或是社会系统,其变化总会遵循着“从平衡到不平衡,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一般演变规律,且具有惯性变化特征。经济不平衡,是社会与政治失衡的主因。经济不平衡发展,总是会受到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共同干扰,内外部条件共同约束使得经济系统经常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一种极为稳定的或过于僵化的平衡,也是不利的,新的平衡会打破旧的平衡,消除不平衡即可实现动态的平衡。一旦经济系统总是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平衡,最不利的影响就是只能够获得量的增长,而不可能有质的变化。在一个平衡的经济系统中,输出与输入也总会是平衡的,因此不存在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动力。为消除各不平衡间的不平衡关系,在宏观的层面谋变经济决策,也就有了总量和结构决策之分,消除不平衡的关键在于能否对不平衡演变能否给出正确的客观的判断。

## 2. 测度方法及理论基础

各种经济指标及其复合指数,总会向着均衡值回归;作为一种宏观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基准,有助于去模拟经济系统运行的动态平衡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相关指标不断趋近的回归平均值水平,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动态平衡过程又是多变的,收敛于正态分布则是唯一可能的结果。社会经济系统内外部驱动力,以及其发展水平的总体呈现也总会是不断地去逼近于平均值,直观再现则是不断地向着常态进行恢复。对经济不平衡发展状态的识别,实为对未来发展进行预警、监测和预测,从而为未来直面失衡谋划治理方略的选择提供依据。可以做出判断,其一,向着均值回归的速度或快或慢,少数的几次大的波动就可能破坏整个平衡秩序;其二,能够使经济不平衡向着均值回归的力量或强或弱,内部的和外部的力量还可能交错,一旦外力足够强大,即使内生动力使其即将靠近均衡水平附近也难以停止,各式失衡或不平衡很可能在均值两端以重复的、不规则的偏离进行着类似于钟摆的运动;其三,所可能回归的均值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多变的,动态的,未来的某一动态平衡正常值很可能被新的正常水平值所取代,对未来的某一正常值也只能做到“事先的一无所知”,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不平衡格局都终将可能出现。

分年度测算发展失衡指数,基于多个指标复合而成用以评估失衡的严重程度,使用基于政府文件文本关键词构造的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等方法逐层合成分类指数和总指数。如何设定失衡的判断标准。统计口径上的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增长率和增长量指标等的划分和应用,并未给出合理的、适宜的经济增速究竟应该是多高?即便是确立了理论上的标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合理的数值,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为了识别经济发展失衡状态,还需要弄清楚失衡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形成机理。将政府当局不断地进行失衡调整的策略中提取的关键词的频次作为权重,文件文本中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本身就是平衡或失衡状态识别的一个关键指标,或者称其为单个指标而成的指数。随时间而变化的权重,恰恰能够弥补不可比的动态演变分析缺陷。将一揽子的指标纳入统一框架中,作为权重的关键词词频数也能反映政府如何秉承“合意性”法则进行决策,而且能够将某一段时期确立的中心的重要性程度反映出来,也即动态调整策略。指标体系构建只是基础工作,一种简化的方法就是从国民经济核算表里去寻找中国失衡的证据,总项指数随即被划为一级指标,再分项引入二级指标,再分项则是三级指标,所有选取的也都是结构指标。

从部门属性来看,经济发展子系统可以划分为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部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细分不同维度又可以采用多个指标,比如刻画经济实力(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经济发展活力(第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汽车拥有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向度,包括人均公路里程、人均用电量、每百万人口医生数。宏观经济系统,仍然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作为复杂系统,其主要特点是非线性,也即存在大量的分岔点,难以进行精准预测。但是,大多数的复杂系统内部运行,都会遵循着相对固定的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运动方式或模式。借此判断,失衡调整的过程就是新秩序重构的过程。

在指数测算过程中,本文的评分标准并不采用一般的做法,即经验值,而是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调整策略安排来求得。根据经社会与经济指标的属性差异,又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具体做法,根据历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频次数,某些年份因未召开会议,因而用早前年份的词频数(统一化处理)来进行替代。采取此做法的理论基础和严谨性论述参见周靖祥(2015),在该项研究中以“城镇化”为例,证实了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经济的策略确实能够依据关键词词频来反映,某一关键词的出现能够体现出决策者的意志,侧重于某一问题的表述更是一种引导微观主体预期的重要手段,还可以折射出是党领导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经济问题的重要思想。将失衡指数测算的时期拉长,追溯到1952年。主要关注各项指标的波动情况,即当期相对于前一期的增减变化情况。如果某一指标正增长则取1,否则取0。针对部分指标还采取其他做法,与任意指标的平均水平值相比是高于还是低于,如果高于则取值为1,反之该项指标的取值为0;也可以确立一段时期(间隔周期或是3年,或是5年,或是更长的10年),并可以求得任意指标的平均水平值,将年度值与之比较,高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通过审读文件,能够找寻到中共平衡发展观形成的哲学基础。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演变趋势的复杂性),失衡与平衡的转换也不例外。在找寻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理论组合之后,借助于数理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构建新的平衡发展理论,当然离不开求解城乡平等和城乡平等的条件,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到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去,如何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系列措施。窥探中国经济发展动态变迁(1952~2014年),分不同维度的失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以能够为后文设计一个有助于实验性的内外经济平衡发展适宜政策组合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透过内外经济联动关系识别,又能够分解出总量失衡的部分结构性成因。为开展内外经济运行状态识别,判断失衡或不平衡发展严重程度,找到治理失衡的边界以能够向着平衡方向迈进。就此而论,一次加权(指标个数作为权重)求得指数,借助阈值法对测算的结果进行无量纲处理。处理方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y_i = \frac{x_i - \min x_i}{\max x_i - \min x_i} k + q \quad (2)$$

借此方法处理的原因,原因是不平衡发展变化总会有惯性(路径依赖),测算的各项失衡指数指标数值( $y_i$ )也会随各种失衡程度的加剧而不断增大( $x_i$ ),各种分解和合成的指数所可能出现的最小值为1( $q$ ),最大值为5( $k+q$ ), $k=4$ ,也即将其转为分布在

1~5 之间的数值。为祛除叠加效应,采取另外一种无量纲处理方式,将其分布“正态化”(去均值除标注差),仍然将其标准化分布设为 1~5 之间的取值(结果见附表),也即:

$$y_i = \frac{x_i - \bar{x}}{\sigma_x} k + q \quad (3)$$

当然,两种处理方法所希望揭示的问题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两种加权方法测度的只是也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失衡及其变化问题,连续化,而且第一种处理能够用以识别逐步恶化的可能性。第二种处理,则可以找到失衡转换观点,以及严重失衡的时间节点。当进行第二次加权处理时,已将中央如何纠偏失衡的“目标”考虑进去,更能反映动态性和调整策略,也即对失衡治理工作效果和治理能力进行评估。为将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动态性刻画出来,进一步构建出动态平衡水平指标,用公式表述为:

$$\bar{y}_T = \frac{1}{T} \sum_{t=1}^T y_t \quad (4)$$

上式中, $T$ 表示时期。当 $T=1$ 时,即为初始水平值;当 $T=2$ 时,即为样本期内滞后于初始值的第二期水平;依次类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平均水平值,即为动态平衡值。当 $t=T$ 时,最后一期的平均水平即为总体平均水平。在本文中,初始值所对应的是 1953 年,最终年份是 2014 年。指数测算的宏观年度原始时序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数据库”<sup>①</sup>。

### 3. 不平衡的维度划分

用以识别不平衡的分类指数划分为:①构建两个分指数用以刻画区域发展失衡,区域失衡指数 1,涵盖了财政、投资、金融和积累的评价;区域失衡指数 2,包含邮政、电信、货物和旅客运输、自然灾害应对能力(以受灾和成灾面积来进行反映,该指数还能够部分地反映出国家能够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和汽车拥有量。②测度城乡失衡发展时又细分为 3 个分指数;城乡失衡 1,主要是由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金融系统信贷的指标合成;城乡失衡 2,主要选取工业经济生产和产品供给来反映;城乡失衡 3,主要采集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生产,将其与工业发展指标相对应;社会与经济失衡,涉及人口、文化、教育、组织和医疗。③为较为清晰地刻画内部经济发展失衡,设计宏观经济增长、消费,以及城乡两部门经济发展;在刻画外部经济发展失衡时,选取指标覆盖了产业、贸易及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外汇储备和涉外税收等)等多项指标。最后还加入了执政与参政评估、政治治理能力分析,选取指标全国两会的参会代表人数。即便如此地细化说明,还是需要做出如下说明:①绝不能简单地将预警等同于预测。②切记,将测算的指数结果只是单项度地反映事实,不能简单将其地作为决策依据。③借助于指数测算结果,其他各项延伸性的研究工作,能够以此为鉴向着省和地市展开。无论国家还是地方,矛盾处理和发展战略安排的时序,以及社会与经济失衡问题的处理,一切都只是“排序”的结果,依据重要性而进行排序选择问题无处不在。

能够借以分析不平衡的又一重要方法论则是复杂性系统分析方法,区别于决定论和能动性哲学论,不做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不平衡的分析,其哲学基础仍然是可能性概念。系统复杂性,则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经济发展过程中,混乱、无序是一种常态,真实经济世

<sup>①</sup> 该网站的网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界中存在的看似无规律的复杂运动形态。各研究领域,将简单与复杂、有序与无序、确定与随机、必然与偶然的矛盾统一在可预知的图景之中(林斌,2017),能够用以解决动态系统中无法用单一的数据关系,而必须用整体、连续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及预测的系统性问题。再平衡的可能性则把不平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起来。不平衡发展作为一种必然性,必定能够区分出再平衡可能实现的要件和不可能实现的不利影响因素之间的界线;作为一种偶然性,失衡则识别出了在可能性的范围内存在不能预决的多个再平衡可能实现的引致因子。治理方略的选定则需要充分结合到不平衡发展的复杂性,既要为微观经济主体规定必须接受的约束,又为政府框定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的空间。

#### 四、测算结果及解释

##### 1. 政府工作报告风向标

就经济发展大是大非和棘手问题的处理而言,历年政府报告都可视为一种风向标。仅从公开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字数来看,1959年字数最多,约为31000字;最少的一年是1975年,仅5000字左右;通常情况下,报告约20000字左右。报告分为三大部分:对上一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当年经济工作开展的总体任务和目标以及当年的政府工作计划。通过提取关键词分析其分布,一定程度上能够透视出国家意志。依据社会、经济进行分组,用计算平均值的方法求得各关键词的词频数据,还可以依据10次、10~20次、20~50次、50~100次以及100次以上,划分为五个等级。核算下来,其中“农”这一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平均达到82次,2003~2012年平均达122次,1955年最多的时候出现295次。其他与发展高度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经济”一次1981年出现279次,1988年该词又出现244次,“社会”一词最多的时候1979年出现151次,1978年以前的1957年(223次)该词出现的频次最多。从经济与社会两个关键词的历年分布来看,从未曾少于10次。大多数年份,前者高于后者,一段时间后者高于前者。中央战略始终秉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超越经济增长(发展)来认识社会建设,和谐的社会的发展也会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sup>①</sup>

就“失衡”一词而言,只是在1990年、2008年和2011年分别提过1次。199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始文字表述,“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建设摊子过大,导致总量失衡,结构恶化,通货膨胀加剧,迫使中国不得不再次对经济进行调整。”2008年,政府报告针对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加进行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11年,一种带有警示性的话语逻辑业已出现,“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另外的表述还有诸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与之对应的是“平衡”一词,几乎每一年都会出现,1992年之前多半都会提及“综合平衡”,自此之后稍有出现,也只有2013年出现过一次。报告中的原话表述是“在财政政策运用上,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扣题政治与经济联动,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专业性和抓好时机精准地针砭时弊,此内容素描实为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治理场景。实现社会和

<sup>①</sup> 依据政府工作报告截取关键词进行分类统计,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用以刻画政经互动过程中“政治”维度的关键词有“中央”和“党”等词汇。

谐与经济平稳增长并不矛盾,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已证明,只有两者协同一致才能够称其为“正态”的发展。

## 2. 内外经济不平衡发展特征事实

通过测算发现,总量和结构失衡相随相伴,并且在时间上总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此处采取二分法,本来可能掩盖了失衡的严重性程度,原因是很难严格地区分出,究竟那些是总量失衡,那些不平衡又只是结构性的。为此,本文将不做出总量和结构的区分,目的就是将其置于统一的内部和外部经济失衡研究框架内,契合于“开放”和“封闭”两种经济类型的划分思想。2011年,G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提出,有必要将一国宏观经济失衡分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且主张采取结构法、时间序列法、分组法、分位数法等进行失衡的测度。并且需要坚持一项基本原则“指标数量有限,重视结构性因素;较为注重被政策影响的一些特殊指标;内外失衡测度同等重要;把住指标重复最小化原则,能够有效地协调行动等”。有研究选取其中的6个指标(内部平衡4个,外部平衡2个)以中国为范本进行测度。测度结果显示,2003~2004年外部失衡指数(1.5)低于总体失衡指数(1.67),2005年外部经济失衡恶化程度高于总体失衡,2007~2008年该数值分别达到最高值3,2009年后才又开始逐年降低(刘威等,2015)。

本文的测算结果也表明,2007年之后,外部经济失衡得到调整,1991年和2004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2008年后,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得以逐步地得到改善,总体失衡程度也有所减轻(项俊波,2008)。2011年,内部经济失衡也得以调整。在测算内外经济失衡指数中,不仅引入政治与经济关系内容指标,还囊括了社会与政治关联维度的相关指标,区分农业和工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失衡。结果显示中国各部门经济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原因是自2008年以来农业经济部门的失衡最为严重,工农失衡致使宏观经济总体失衡迟迟得不到调整。1980年以来,宏观经济一种处于超长失衡状态,而且从未得到根本上的根治。长期以来,农业经济严重失衡,恶化或是调整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失衡较为严重。世界银行2007年12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关键性挑战仍然是重新平衡经济;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程度在不断加剧。

借助测度的失衡发展指数,回看1975~1978年的各项失衡尤其严重,在10个失衡分项指数测算结果中,各年不平衡水平值高于4的依次为7个、5个、5个和6个,取值低于2的指数1975年1976年分别只有1个和3个,相比较而言1976年的发展要正常得多。1979年至2014年,包含宏观经济、消费和城乡关系的内部经济失衡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尤其是2000年至今最为严重。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经济工作任务要求的论述,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年确定的第一工作要务相比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和国家要反复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或许这是应对难题时,所做出的战略安排也仅仅是因为没有选择而采取的“次优选择”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在解决失衡难题时,又恶化了失衡,出现了路径依赖更棘手的发展难题。<sup>①</sup>结构性问题说重要也不重要,总量难题解决了很可能就会自然化解,数据预处理(增长水平)已经潜藏此内容;引入绝对量指标并非不关注结构性失衡问题,采用结构指标测度的结果是一致的;反过来,恰恰是我们选择的指标做到了总量和结构、增速和增长水平的多项指标统一,借助结构指标算出的结果与这里的指数变化具有一致性。

<sup>①</sup> 指数测算的详细结果在文章中未列举,也不做逐一阐述,若有感兴趣者请与作者联系。

### 3. 不平衡发展预警监测

前面已经反复论述过,全球诸国都普遍关注经济失衡发展问题的破解,并希冀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大国之间达成共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变中出现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即为结构性失衡,当然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种常见现象,只不过是各种经济失衡事实中的一种而已。目前学术界的诸多研究中,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定义较为精准,“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空间布局及国内外经济的有机联系被割裂,长期较大幅度地偏离均衡状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不可持续发展,并可能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的一种状态。”(项俊波,2008)该项研究的作者在文章中还指出,就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言,内在地要求做到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协同统一,其中动力机制是发展持续的内核,平衡机制是基本前提。如果没有有效的平衡机制,动力就会变成阻力。该项研究确立的指标选择标准是:代表性、独立性、国际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最终依据所筛选出来的21个指标进行指数测算。已有的研究工作都为本研究的失衡指数有特别重要的启发,尚有诸多可以突破的地方,正是如此才有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必要性。

为了进行横向(各类指数)和纵向(随时间而变化)的比较,对测度的失衡指数进行两次加权,测算方法与前述一致。透过政府工作的加权处理,结果发现2004~2010年强调中央领导的色彩较为浓烈,相比较而言2013年减弱,2014年后又在逐步强化。外部经济治理方面,1991年~1993年中央层面更为重视,使用词汇则是“对外开放”和“开放”;2015年以后,国家领导人更加强调开放的重要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则更胜一筹。城乡失衡治理方面,2006~2014年中央政府对此问题特别重视。国家对于工业化和工业经济结构性指标的重视程度,在1955年就创下了历史奇迹,此后针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再未出现过,虽然之后的1958年和1959年对此项工作也特别重视,但提法出现的频次并未超越之前的1955年。有趣的是,1955年甚至可以视为工农关系调整的重大转变年,当年对农业问题的重视程度,此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官方话语表述则是“工业是基础”。种种迹象表明,1955年才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元年”,重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主要目标是谋求平衡的发展。1957年和1978年,则是中国政治(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因为为后来的增长与发展准备了“上层建筑”如何启动的充分条件。

为了能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采取加权方法生成指数,原因是采取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改变原始指标数值的分布,只是便于比较。指数取值不再是简单的1,2,3,4,5共5个值,分指数最终都构成一个连续变量。生成权重矩阵之前,就已经做了二次加权处理,最终测度的失衡治理评价指数(平衡性)则是五次加权的结果,将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内——三位一体。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揭示出政府是如何对待发展(追求趋近于平衡的发展目标),那些地方要有所为?那些可以“无为”。那些地方做得好?那些地方又做得不好?综合失衡识别和治理失衡的评价结果(最高分值是50分,也即治理水平的天花板),总体看来,需要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和区域发展失衡破解这方面的管理工作。当然,治理评价的客观与否,还取自于失衡水平值分布特征,以及各种失衡是向着何种方向变化。失衡程度越高,也就对应着该项分值越高。平衡程度越高,得分就会越低。因为失衡突破警戒线,必须直面困局。开展不平衡治理的测度与分解,不平衡诊断和失衡预警,治理目标设计和约束条件识别研究工作,哲学基础仍然是均值回归原理、无序复杂性理论和实践认识论。

透过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不难觉察到大量的管理工作要求多半是为“救急”。本文展开

评价研究的初衷,就是综合分析和利用失衡程度评价结果;提早应对,而不是突击应付。当然,借助于结构性指标、增长速度指标也能够测度出失衡指数,测算方法和数据处理的做法与此类似。注意到,无论是失衡指数还是治理指数,都是动态的、可比的、与时俱进的。借助于测算结果发现,2004年和2011年中国经济已经拉响严重失衡的警报,以直观图示展现的结果一看便知。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谋划平衡发展策略?理论上讲有种种的策略选择,但抓住宏观经济失衡的一面来进行攻破,2012年针对不平衡问题的重视和治理措施的设计确实有意或无意地抓准了内部不平衡发展问题加剧的实情。为化解内部经济失衡而采取的治理行动,也可能会促成总体平衡。

## 五、结束语

本研究建构的一整套的测算方法和思路,适用于省级政府执政能力和失衡治理能力(成长为善治型政府的可能性)评估,到地级市、县级政府依然成立。决定指数测算精准性的关键因素不是方法论本身,而是宏观统计数据的质量,采取0和1赋值的做法虽然能够部分消除数据质量不高带来的白噪声干扰。缘起于本文所选择的指标,做到了总量和结构、增速和增长水平的多项统一,借助于结构指标测算出的结果能够素描不平衡发展格局。提取特征事实以经验研究结果为依据,概言之,将“实证和规范”进行融合。能够攫取经验证据并且使用了规范性的分析研究方法,回应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适度的?”、“什么是最优的?”的价值论断。当然,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指标也可能不断地进行调整,并逐步地将防范经济危机、纠正内外失衡纳入管理工作的常态化目标当中;极有构建一整套的内外失衡预警机制与预警信息管理系统,以构造起中央(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能够得以互动的失衡预警系统,提取有效的可利用的信息方能进行失衡监测、预报和应急管理,提升政学两界有关于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统计资料整理、分析、风险评估、失衡诊断与非常规难题处理的能力。

在失衡指数测算时,借助政府工作报告构建了“失衡治理评价”指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针对于政府发展社会与经济的效能评估提供量化处理证据,对中央政府全过程管理经济工作的能力评估,包括前期的效果(总结)、当期的经济工作(具体要求)和未来方向(统筹谋划)。仅借助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做量化处理,得到诸多“意外”发现,关于增长与发展、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失衡与平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脱轨等的话题,都可能有再度深入研究的必要。并非所有的失衡都是不好的,不利的;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出现了的平衡都是好的。失衡也会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称其为失衡的增长。持续的恶化的失衡,可能会倒逼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相机调整。测算的结果说理,只为激起管理当局的重视,失衡指数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关键词词频数变量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即某一段或一段时期失衡一旦不断恶化,政府有必要采取与之对应的策略。近年来,各项失衡治理指数的分值普遍走低,不能简单地粗浅地理解为政府治理失衡无作为,还以为失衡得以不断调整,越来越趋近于平衡。可以依此为依据考虑制定善治型政府的行为准则,将各项经济和社会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不怠慢治理失衡的最佳时机。

为开启发展经济学问题研究的中国新时代,亟待关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集中爆发的各种不平衡治理难题,正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几乎陷入停滞、不协调的发展难题,谋划治理之策。就此而论,失衡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的棘手难题,就算是再发达的深陷外部失衡发展泥潭的美国和日本,也要面临失衡发展难题。通常而言,经济学意义均衡的定义与物理均衡的定

义有所不同。以钟摆为例,当钟摆处于静止或减幅摆动状态时,既不能界定为经济均衡,更不是经济不均衡,就因钟摆没有任何预期。进入均衡模型的微观经济主体,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他们还出色地掌握了知识,拥有自己的判断力。平衡的内涵则相对贫乏,缺乏非常严格的定义。给出失衡的判断,要区分出哪些属于“好的失衡”,即一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配置消费和投资的最优决策;哪些又属于“坏的失衡”,即一国在利用国内外资源过程中,难以实现长期最优配置。值得注意,贸易和财政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失衡”,类似地,逆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坏的失衡”。<sup>①</sup>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针对于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函数,一部分指标要求变异大一点的,方差越大越好,而另外一些指标则要求变异程度越小越好。

在 Hirschman (1958) 所创立的理论思想体系中,有关于“增长经济学”的论述文字,曾经题注“是促进还是妨碍”,批判性地指出,“任何能使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工作,能够从最新研究中汲取知识的有益尝试,都不应当受到指责”。在他个人看来,增长经济学适用于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理论则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重新阐述清楚基于开放经济条件假设的平衡发展理论,需对相关理论进行回溯性梳理。均衡,实质是物理学研究中所惯常使用的概念,却又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模型能够求解的理想状态或目标;平衡,中国话语体系中则体现为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运行目标;由于各国、各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是国内经济的横断面向外延伸,内部经济发展失衡必然会影响到对外经济发展失衡,反之亦然如此。方法论层面,现代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并非一无是处,提取诸如一般均衡、非均衡这样的规范概念,有助于理论界萌生出共同话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也并非“落伍”和不合时宜。就中国发展问题而言,两者都有其长处又内存弊端。希尔取其精华,以为创新研究方法提供可能。只要理论界做到足够自信,建构契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情的经济理论并非不可能。

### 参 考 文 献

- [1] Drucker P. F., 1986, *The Changed World Economy* [J], *Foreign Affairs*, 64 (4), 768~791.
- [2] Hirschman A.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 [3] Hirschman A. O., 2013,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New in Paperback)*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 李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的利益驱动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J],《财经研究》2005年第4期。
- [5] 李扬、张晓晶:《失衡与再平衡——塑造全球治理新框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
- [7] 林斌:《混沌理论用于语言研究》[N],2017年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8] 刘威、舒琪、金山:《基于G20评估体系的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测度——兼论中国外部失衡治理的影响因素》[J],《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 [9] 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人民出版社,1982。
- [11] 周靖祥:《失衡中国窥探:内外联动的平衡发展之路选择》[J],《科学发展》2012年第9期。
- [12] 周靖祥:《中国区域城镇化差异及成因解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 [13] 周小川、李剑阁、苏中:《经济增长模型的递推规划方法与最优平衡问题》[J],《系统工程理论

<sup>①</sup> 此处主要文字内容转自李扬和张晓晶(2015),在其专著中的相关内容阐述却更为详细。

与实践》1985年第3期。

[14] 左然：《布哈林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试析》[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88年第4期。

## A Study on the Measure and Strategy & Governance of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Zhou Jingxiang

(Busines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Research Objectives:** Deconstructing the occurrenc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Chin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l. **Research Methods:** Measure of Index using Macro-data sets, extract the whole generation keywords from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report,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take the keywords frequency as the weight (distinguish order of priority for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field), and then carry out risk assessm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uneven development, use the threshold method to measure and decompose. **Research Finding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has obvious inter-temporal imbalance, uncertainty and dynamic complexity, Since 1982,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rogress and setbacks zigzag obviously trend; after 2012, Pa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strategy makes the possibility of gravity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balance target in increasing approximation. **Research Innovations:** By introducing the pa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duality theory framework of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 system". **Research Value:** Constructing the balance theor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the methodologies for the choice of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 Governance.

**Key Word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Unbalanced Governance; Op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A11; E61; N01

(责任编辑：彭 战)